

從地域文化看蘇軾詞的杭州書寫

顏智英*

〔摘要〕

杭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發展歷史，自古以來即為東南方極秀麗繁華的海城，具有「山水登臨之美」與「人物邑居之繁」的地域文化特色。自北宋中期起，杭州更成為商業繁華的大都會；而詞體的創作和流播又與商業發達的城市有密切的關連，像兩度仕杭、與杭州情緣最深的蘇軾，就寫出多達近五十首關於杭州自然與人文的詞篇，遠遠勝過北宋其他詞家。蘇軾是一位內涵豐富、思想複雜又個性開朗的文人，在其心眼靈視下的杭州所呈現的自然與人文風貌，以及其居杭的內在情志與杭州地域的關連，是十分值得探究的課題，本文即從此二面向來探究其詞的「杭州」書寫，期能透視在其深刻凝視下的杭州都市型態，以及杭州地域文化對其詞內容與風格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蘇軾詞、地域文化、杭州書寫、自然、人文、情志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杭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發展歷史，自古以來即為東南方極秀麗的都會，具有山水之美與繁華富庶的地域文化特色。杭州，古稱錢塘，左有錢塘江、右有西湖及環湖山脈，具有山水之美。南朝時尚為處於東南沿海的蕞爾小縣，到了北宋，由於商業性城市高度發展，市民階層亦隨之形成，交通發達的杭州已發展成一個繁華的城市，¹歐陽修〈有美堂記〉便稱道：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聚，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²

指出北宋的杭州，是一個兼有「山水登臨之美」與「人物邑居之繁」的秀美繁華城市。

北宋詞家蘇軾（1036-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一生政途坎坷，四處宦遊，然自稱「緣在東南」³，與杭州的緣分最深。曾兩度仕杭：第一次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乞補外任，於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至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1074）九月才去職；第二次則是欲從朝廷政爭中抽身而接連乞求外任，終於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三月獲准出知杭州，七月至杭州任上，元祐六年（1091）三月才去職，總計在杭州四年又六個月。杭州的山水風光與城市生活，再加上與詩人詞友密集的社交飲宴，就成為推動蘇軾勤於詞筆⁴的最佳環境。仕杭期間，他不僅用心治理

¹ 吳越王錢鏐採「保境安民」之策，使杭州能避開戰禍，亦是杭州能發展成東南第一大都會的原因之一。詳參倪士毅：〈治杭八六載有國七二年——吳越國始末〉，周峰主編：《吳越首府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

² [宋]歐陽修：〈居士集〉，《歐陽修全集》，卷40（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頁280-281。

³ [宋]蘇軾：〈與惟照〉，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4（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532。

⁴ 蘇軾何時染指詞事，各家說法不一，如朱祖謀《東坡樂府》首為蘇詞編年，認為其最早詞作為〈浪淘沙〉（昨日出東城），作於熙寧五年壬子（1071）；而後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則謂最早的蘇詞為作於嘉祐五年（1060）的〈浣溪沙〉（山色橫侵醜暈霞）；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則謂作於治平元年（1064）的〈華清引〉（平時十月幸蓮

杭州，與文士的往來又特別頻繁，其應歌之作中常將對此一特定都市空間中人事物之凝視、聆聽、互動與感發寫入詞中，有近五十首之多。他是一位內涵豐富、思想複雜又個性開朗的文人，探究其心眼靈視下的杭州所呈現的自然與人文風貌，可以具體觀察北宋中期杭州的都市型態；⁵研析其居杭的內在情志與杭州地域的關連，可據此觀察杭州地域文化對其詞內容與風格創作上的影響。

可惜，研究蘇軾杭州詞者，多從文學性的角度對其詞內容、形式與風格作一般性分析，如：林慧雅《東坡杭州詞研究》、許錦華《蘇軾元祐詞研究》、韓凌〈蘇軾倅杭詩詞〉、馬學林〈論蘇軾的兩次仕杭詞〉等，⁶較少學者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觀察蘇軾詞與杭州地理、人文的關連，⁷是以本文擬從「杭州」地域書寫的角度出發，探討蘇軾詞筆下的杭州與方志、雜記及其以前北宋詞家所寫杭州有何異同，並由此觀出其對前人的繼承與新創之處；其次，由「蘇軾」情志書寫的角度來探究杭州自然風景與人文氣氛對其情意的觸發。期能具體看出蘇軾詞中杭州的特殊意象，以及在杭州地域文化影響下蘇軾的心靈圖景。

湯)為其第一首詞。然可以確定的是，蘇軾通判杭州兩年多，即已創作了不少的詞作，據薛瑞生統計，多達五十七首之多。詳見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37。

⁵ 夏承燾〈西湖與宋詞〉指出，宋代詠西湖詞作中往往反映出宋代的都市型態、遺民亡國之情與知識份子對政治生活的態度。由此可知，與城市關係密切的詞作，可作為研究當時社會狀況的一條途徑。收於《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冊，頁134-152。

⁶ 林慧雅：《東坡杭州詞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2002年)、許錦華：《蘇軾元祐詞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1997年)、韓凌：〈蘇軾倅杭詩詞〉，《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95年)，頁49-64、馬學林：〈論蘇軾的兩次仕杭詞〉，《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第1期(2007年)，頁135-137。

⁷ 雖有大陸學者吳德崗：〈地域文化與蘇軾詞的創作〉，《文史雜誌》第2期(2001年)，頁38-40)、焦俊霞：〈地域文化對蘇軾詞的影響〉，《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第5期(2003年)，頁59-61。二文從地域文化探討蘇軾詞，但僅略舉幾篇詞作，未對蘇軾所有書寫杭州之詞作全面分析。

二、杭州書寫——以「杭州」為中心的考察

(一) 方志、雜記與蘇軾以前北宋詞家的杭州書寫

關於宋代杭州具體的樣貌，在方志與雜史筆記⁸中有著較客觀而全面性的呈現。例如施諤《淳祐臨安志》從城社、官宇、舊治古蹟、今治續建、學校、樓觀、園館、廂隅、軍營等項目一一加以具體介紹，⁹將城內繁雜的人、事、物，以簡明而客觀的文字作全面而概要的紀錄，映現出杭州城的繁華榮景與宋朝的太平氣象；又如周密《武林舊事》對西湖之景及遊客之盛、遊覽次序，以客觀之筆作詳細描述：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閒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¹⁰

此外，書中對立春、元夕、元正、放春、端午、乞巧、中元、中秋、觀潮、重九、開爐、冬至、賞雪、歲除等節慶習俗的記載亦無一遺漏，甚至諸市、瓦子勾欄、酒樓、歌館、貨物、作坊、市食、諸色伎藝人等風土民情的書寫，亦十分周備。方志、雜記中對於杭州山水與人文所作的客觀而全面的書寫，能提供讀者一種真實的社會生活紀錄，完整地呈顯出北宋杭州秀麗繁華的實際面貌。

但是，這樣的書寫方式，作者本身的情感是隱而不見的，詞作則不然，詞家在寫景之後，往往會出現主觀情意的書寫；或是藉由意象的表現寓情於其中，這是詞與方志、雜記最大的不同。

由於詞體形式的限制，詞家們無法如方志、雜記般以極大的篇幅來書寫其對

⁸ 今日可見的相關方志有周淙《乾道臨安志》、施諤《淳祐臨安志》及潛說友《咸淳臨安志》等，雜史筆記如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錄》、吳自牧《夢粱錄》及周密《武林舊事》等。

⁹ 參〔宋〕施諤：《淳祐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¹⁰ 〔宋〕周密：〈西湖游幸〉，《武林舊事》，卷3。收於《叢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217冊，頁48。

杭州的全面印象，而是採取以小景點說大世面的書寫方式；詞家們憑其獨特的視角仔細環視與觀看書寫對象，再輔以較多的想像或聯想，通過具體的概念去思考（Think）其形貌、樣式，才造就出其對象的意識，如此所選取的意象，有著較多的象徵（Symbolic）性質，¹¹不僅可表現作者個人對杭州的主觀印象，還往往透顯出詞家個人的情志內蘊。例如蘇軾以前書寫杭州的北宋詞家——潘閬、柳永與張先，皆各自憑其視角慧眼，來選取能表現其情志的意象，茲分述如下：

宋初潘閬〈酒泉子〉十首，率先以小令形式對杭州作多面向的書寫，表現出杭州山水與人文的景致；且採景點分列的方式，分別寫出追憶中的杭州印象，如：

長憶錢塘，不是人寰是天上。萬家掩映翠微間。處處水潺潺。異花四季當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別來隋柳幾經秋。何日得重遊。（其一）
長憶錢塘，臨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攜杖徧曾遊。閒話覺忘憂。梅檀樓閣雲霞畔。鐘梵清宵徹天漢。別來遙禮祇焚香。便恐是西方。（其二）
長憶西湖，湖上春來無限景。吳姬箇箇是神仙。競泛木蘭船。樓臺簇簇疑蓬島。野人祇合其中老。別來已是二十年。東望眼將穿。（其三）
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閒整釣魚竿。思入水雲寒。（其四）¹²

一、二首描寫的是杭州臨水傍山、花木掩映的住家與寺廟，三、四首寫出西湖的季節之美，另有五至九首則勾勒出杭州諸山（孤山、西山、吳山、龍山等）的清幽出塵，第十首讚嘆錢塘潮的驚心動魄。此十首組詞，不僅書寫出上列杭州重要的景觀，還描繪了杭民西湖競船、垂釣吹笛的娛樂活動（第三、四首），以及杭州八月觀潮、弄濤的特殊風俗。值得注意的是，潘閬以一位隱士的身份，選取了諸多清幽出塵的意象來書寫杭州，如：「鐘梵清宵徹天漢」（其二）、「吳姬箇箇是神仙」（其三）、「三三兩兩釣魚舟」（其四）、「閣上清聲簷下鐸」（其五）、「峰上塔高塵世外」（其七）、「門前歲歲生靈草，人采食之多不老」（其九）等，把杭州描寫為「不是人寰是天上」的出塵之境，也暗示了作者的出世之想。

¹¹ 參薩特著，李一鳴譯：《想像心理學》（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頁8-9、160。

¹²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廣文書局，1998年），第1冊，頁5。以下凡引蘇軾以外諸家詞作，皆直接以括弧注明其頁碼，不另作注。

柳永的〈望海潮〉，在書寫的內容與方式上，卻表現出與潘詞頗大的歧異。〈望海潮〉是柳永自製的長調，由於是仁宗朝時與杭州太守一同觀潮、獻給太守孫沔的頌詠之作，¹³因此，詞中內容以實寫杭州的繁華秀麗為主，且在書寫方式上有別於潘閬景點分列、追憶式的表現，而是採「以賦為詞」的手法，以便於將杭州的全貌作「實空間」的鋪敘：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頁 39)

詞中以「十萬」、「怒濤」、「競豪奢」、「三秋」、「十里」、「千騎」等壯闊的字眼形容作者「望」海潮時眼前所見的杭州實景，在景觀上「鋪敘展衍」¹⁴出城內十萬住家的如畫之美、錢江大潮的迅猛壯觀、西湖湖山的清嘉秀麗；在娛樂上書寫了平民的歌吹嬉釣，以及太守的醉聽簫鼓、吟賞美景；在風俗上，以「市列珠璣，戶盈羅綺」來具寫杭州人文的自古繁華豪奢。不同於潘閬的置身其中（潘詞中可見作者己身「遊」的紀錄），柳永不寫自己遊賞的歷程，而是站在一個定點，從市民階層的視角出發，以類似方志、雜記客觀而概括的實寫方式來書寫杭州，予人身臨其境之感，客觀地反映出仁宗時都市繁華與太平景象的實況；但有別於方志、雜記的不見作者情志，柳永在詞末仍表現出對太守歌功頌德的渲飾動機。

柳永〈望海潮〉實寫杭州繁華秀麗的城市意象與歌功頌德的作意，對張先的影響甚大，〈破陣樂·錢塘〉就繼承了這樣的書寫內容與方式：

四堂互映，雙門並麗，龍閣開府。郡美東南第一，望故苑、樓臺菲霧。垂柳池塘，流泉巷陌，吳歌處處。近黃昏，漸更宜良夜，簇簇繁星燈獨，長衢如畫，暝色韶光，幾許粉面，飛甍朱戶。 和煦。雁齒橋紅，裙腰草

¹³ 詳參薛瑞生：《樂章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9-11、173-175。

¹⁴ 李之儀稱美柳詞：「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見〈跋吳思道小詞〉，《姑溪居士文集》，卷40，《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第1037冊，頁2。

綠，雲際寺、林下路。酒熟梨花賓客醉，但覺滿山簫鼓。盡朋游、同民樂，芳菲有主。自此歸從泥詔，去指沙堤，南屏水石，西湖風月，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頁 69)

作者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以客觀的視角實際描寫杭州城內住戶環境的秀麗堂皇、人文景觀由日到夜的繁華熱鬧、西湖湖山的景色之美以及杭人的遊賞之樂。雖然所取之景不如柳永〈望海潮〉的壯闊盛大（張詞中沒有錢塘海潮的描寫），僅呈顯出承平時期的清幽韶麗的杭州意象，但詞末「好作千騎行春，畫圖寫取」二句，亦明白表現出歌功頌德的寫作動機。

（二）蘇軾詞中的杭州書寫

感情熱烈奔放、想像力豐富奇特的蘇軾，對於山水自然風物，常常不僅僅侷限於如實的感受，而能以「妙觀逸想」¹⁵、浮想聯翩的比喻或象徵來描寫，因此，其筆下的杭州意象不僅繼承了潘詞的出塵之美、柳詞的寫實之貌，更能突破前賢，在寫景、敘事、抒情上更加多樣、深入，表現了蘇軾獨具的內在情思與性靈，即融攝著個人出世的自由曠達之思與當權者入世的愛民親民之情。

1. 出塵的杭州

關於西湖，潘詞以「神仙」、「蓬島」、「魚舟」、「白鳥」、「魚竿」、「水雲」等出塵悠閒的人、物意象來描寫西湖春與秋的清幽之美，寄寓了一己的出世之想；蘇軾詞中亦繼承潘詞以出塵意象寫己身悠閒之情的方式，但卻以更大的篇幅與更多樣的人、物描寫來歌詠西湖，且喜以「煙」、「雨」等詞強調西湖雨中、雨後的空濛之美，如〈減字木蘭花〉：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煙雨裏。疏影微香。下有幽人畫夢長。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颺紅輕。時下凌霄百尺英。¹⁶（熙寧七年夏）

¹⁵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 4，《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474 冊，頁 23。

¹⁶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62。以下凡引蘇軾詞作，皆直接以括弧注明其編年及頁碼，不另作注。

蘇軾將好友清順（詩僧）居處蒼勁凌雲的古松，想像成煙雨中挺立的「龍」姿，在出塵的意象中暗示了主人的高潔品格；「疏影微香」則調動了嗅覺來勾勒環境的幽雅宜人，「下有幽人晝夢長」更展現出主人安貧自樂、清幽閒適的高貌神姿。「湖風清軟」、「雙鵲」噪晚的清靜之景，具體呈顯出西湖幽靜恬適、超然塵外的特殊風貌，表面上寫清順居處西湖的怡然無憂，實亦透顯了蘇軾己身的閒適之情。

再如〈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熙寧六年六、七月間，頁31）

雨後初晴的西湖，風清霞明，具有潔碧秀美之容；「盈盈」的荷花、翩然飛至的白鷺、如湘靈仙子彈奏的箏聲，都為西湖增添了一股空靈秀逸的仙塵氣息。此詞雖有一些關於蘇軾遊湖韻事的記載，¹⁷表達了一種不見佳人、悵然若失的情懷，但由其寫景的清朗風格中，仍可感受到作者觀賞西湖勝景後愉悅的閒適之情¹⁸。又如〈好事近·湖上〉：

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吹墮

¹⁷ [宋]張邦基：〈東坡西湖長短句〉，《墨莊漫錄》云：「東坡在杭州，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1，頁32；又袁文《甕牖閒評》云：「東坡倅錢塘日，忽劉貢父相訪，因拉與同遊西湖。時二劉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婦人甚佳，見東坡，自敘『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無由得見。今已嫁為民妻，聞公遊湖，不避罪而來。善彈箏，願獻一曲，輒求一小詞以為終身之榮可乎？』東坡不能却，援筆而成，與之」。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卷5，第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頁5522；近人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肯定《甕牖閒評》所記之事，認為「詞中所詠，皆當時事也」，見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卷1（臺北：華正書局，1978年），頁10。

¹⁸ 參葉嘉瑩主編，朱靖華等編：《蘇軾詞新釋輯評》（上）（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頁139。

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棹小舟歸去，任煙波飄兀。(元祐五年九月，頁633)

雨後初晴，西湖湖面煙霧瀰漫、偶有溪風吹動，但湖水泰半時候皆平靜如鏡，呈現出一幅閒散恬淡的意境。蘇軾雖從湖面照見自己的「衰顏華髮」，從心底升起一絲「寒」意，但生性曠達的他，仍能從嘆老、憂時的情緒中解脫，獨棹小舟，盡情享受眼前出塵的景致，一任西湖煙波東西飄蕩。

此外，西湖周圍群山中，其南山山脈之雲泉山有一「風水洞」，景致特別清幽，¹⁹唐時白居易就曾來游，並留有〈游恩德寺〉一詩；蘇軾亦兩度造訪，並作詩五首（今存三首）、詞一首，其〈臨江仙〉詞題更直接標明為「風水洞作」，可知他十分鍾愛此地山水，詞云：

四大從來都遍滿，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為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層巔餘落日，草露已沾衣。(熙寧六年八月，頁40)

施諤《淳祐臨安志》載其得名之由為：「洞極大，流水不竭。頂上又有一洞，過立夏，清風即自內出，立秋則止，故名風水洞」²⁰，是以清「風」送香、流「水」舞藻等清美出塵景致便是風水洞最大的特色。蘇軾還想像盧仝若以此處清水泡茶、必覺兩腋生風不羨天仙，²¹使得風水洞更具飄逸出世的風姿。結尾「草露已沾衣」，則暗示了自己如陶潛「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閒適心境，此行滿足愉悅的心情顯露無遺。

錢塘海潮，亦為杭州重要的景點，然而潘閻〈酒泉子〉僅以「來疑滄海盡成

¹⁹ [宋]蘇軾〈往富陽新城，李節推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云：「風巖水穴舊聞名，又隔山溪夜不行」，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9（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30。可知風水洞是一處舊已聞名的、地處偏遠的、風景幽深的景點。

²⁰ [宋]施諤：《淳祐臨安志》，卷9，頁4924。

²¹ [唐]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卷388（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392。蘇軾藉盧仝之典讚賞洞中之水清冽美味，若借予盧仝泡茶喝，必覺兩腋生風，不羨天仙了。

空，萬面鼓聲中」的視聽誇飾，形容海潮來臨時驚人的潮勢與潮聲；蘇軾則能憑其天縱的才情與獨特的政治經歷，藉大量神話、傳說對潮勢與潮聲作更生動、鮮活的描寫，使全篇充滿浪漫出塵的神話色彩，也寓託了其急欲超脫生命桎梏的自由之想，〈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和蘇伯固二首〉云：

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
輓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
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此世一塵砂。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
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聾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元
祐五年八月，頁 620）

以無名氏乘槎上天的神話²²比擬錢塘海潮似欲直上天河的浩大潮勢，以道教中謫降人間、為人指點虛無的美麗仙女「萼綠華」的從天而降²³擬寫潮水在上昇之後、由天際飛瀉而下的奔騰壯觀，以「飛昇」的道人²⁴寫潮水再一次地衝天而上，「住在

²² [晉]張華《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收於陳文新：〈雜說下〉，《六朝小說》，卷 10（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頁 42。

²³ 萼綠華的事蹟見於《真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為師母毒殺乳婦，玄州以先罪未滅，故今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此女已九百歲矣。」〔南朝·梁〕陶弘景：〈運象篇·第一〉，《真誥》，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14。她雖已九百歲，形貌卻如二十許的美麗姑娘，原是九疑山的得道女，因曾為師母毒殺乳婦，所以謫降人間，藉指引羊權修道以贖其前世的罪過。這種神女來降凡夫的情節，象徵著身處六朝、崇尚隱逸自在的羊權意欲修道、擺脫人間糾葛的堅定決心。

²⁴ 「飛昇元不用丹砂」，源自《南史·陶弘景傳》：「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唐〕李延壽：〈陶弘景傳〉，《南史》，卷 76（臺北：鼎文書局，1994 年），頁 1899。可知道教認為道人能藉服食丹砂煉成的丹藥而羽化登仙。蘇軾反用其意，想像自己看見一位道人飛昇上天、羽化登仙，卻不必藉由服食道教的丹砂。

潮頭來處、渺天涯」則想像海潮在一陣翻騰後、最終停止於潮頭發生的美麗仙境中，²⁵這些神話傳說顯現了錢塘海潮從發生到結束的視覺上豐富多樣的變化，在浪漫出塵的意境中寓託了作者意欲脫離塵世、尋求精神自由的情思。至於「雷輓夫差國」四句，主要以天上的「雷輓」、傳說的「伯牙水仙操」²⁶為喻，寫潮聲的撼人心弦與妙絕天下，亦予人出塵的綺思遐想。作者面對此一人間罕見的壯觀海潮，益發感到自身如「塵砂」般渺小，在感嘆「身世兩聳牙」的失落中，內心興發的是：意欲仿效李白「騎鯨」仙游的逍遙之舉，對道教仙鄉「三山路」、桃源漁家「一葉家」等理想世界的嚮往。

2. 寫實的杭州

柳永〈望海潮〉曾從平民的視角，客觀而概括地實寫出杭州的景觀之美（城內住家、錢塘江潮、西湖湖山）、杭人的娛樂之姿（歌吹嬉釣、聽鼓賞霞）與人情風俗之奢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呈顯了北宋承平富庶的意象，並於詞末點出歌頌杭守功績的作意；而蘇軾在這種寫實精神的基礎上，除了對杭州的景觀之美、娛樂之姿作更多樣而深刻的描繪外，還增添了節慶風俗、城市人物的書寫。值得注意的是，他採取了當權者的視角，在杭州太平富庶、奇美繁華的意象投射中，強調了自己對杭州人物的用情至深，不同於柳詞渲飾太平的作意，更多了作者的性靈與情思。

²⁵ 《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晉〕張湛：《列子注》，卷 5，《新編諸子集成》，第 4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3 年），頁 52-53。潮頭的來處是一個向東「幾億萬里」的「無底之谷」，其間有五座大山，且有神仙自由地飛居往來，是一處有著食之能長生的花果的仙境。

²⁶ 《樂府古題要解》：「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延望無人，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但聞海上水汨汨瀾澌之聲，山林窅冥，群鳥悲號，愴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手。」〔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下，《叢書集成》，第 2682 冊，頁 58。

(1) 描繪杭州地景之奇美：

位於東海之濱的杭州，西邊擁有山光水色的西湖，東邊帶有雄偉壯闊的錢塘江，其如畫的奇特美景，早在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命梅摯知杭州時，即有「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²⁷的讚語；蘇軾通判杭州時，亦對杭州特有的風景讚美有加：「錢塘風景古來奇」（〈訴衷情〉，頁 69）、「湖山信是東南美」（〈虞美人〉，頁 67），奇與美，是蘇軾對杭州地域景觀整體的評價與讚賞。無論是城內柳永筆下的「煙柳畫橋、風簾翠幕」的住家，或是城外「重湖疊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湖山，以及「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的錢塘江，都各有其景觀上的奇美之處。這些杭州美景，柳永採取的是對偶與誇飾手法，而蘇軾更能馳騁其想像力，以各種譬喻及轉化作更生動的勾勒。就城內而言，他特寫了最繁華之地——沙河塘²⁸：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須²⁹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為杭守陳述古作〉，熙寧七年七月，頁 67）

作者實繪自吳山「有美堂」³⁰居高遠眺的景致，藉沙河塘美景反襯出送別太守陳襄的惆悵之情。他從視覺上描寫沙河塘華燈初上的繁華熱鬧、金碧輝煌，從聽覺上寫其所聞〈水調〉之曲的淒婉動人，最特別的是，將倒映錢塘江中的一輪明月比喻成明澄碧透的「琉璃」，使得「沙河塘」繁華中有清朗的美麗夜景如在讀者目前。

²⁷ [宋]宋仁宗：〈賜梅摯知杭州〉，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354，頁4399。

²⁸ 「沙河塘」在杭州城南五里。參[宋]潛說友：〈山川·塘〉，《咸淳臨安志》，卷38（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頁381。宋時已為杭州熱鬧繁華之區，歌館、書場，多集於此，《西湖游覽志餘》，卷21有云：「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叢書集成續編》，第6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頁716。

²⁹ 「須」，一作「彌」，見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卷1，頁10。

³⁰ [宋]傅幹《注坡詞》引《本事集》云：「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數日，宴僚佐於有美堂。侵夜，月色如練，前望浙江，後顧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陳公慨然，請貳車蘇子瞻賦之，即席而就。」見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頁69。

就西湖湖山³¹言，蘇軾曾讚譽西湖為「天下景」³²，在與林希交接杭州太守職務時，更只將「湖山公案」交與新官，認為「此景百年幾變，箇中下語千難」(〈西江月·杭州交代林子中席上作〉，頁 675)，對西湖湖山之美推崇備至。他酷愛西湖，倅杭時即寫下許多詠讚西湖的詩篇，〈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其二〉云：「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³³，首先將西湖比喻為出身杭州的美女西施，把山水之美轉化成美人之美，令後人讚美不絕；³⁴〈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亦曰：「雲山已做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³⁵，以歌女之柳眉喻指西湖的雲山，以其清明之眼喻指孤山周圍的湖水，使西湖更具溫柔明媚的宛轉之姿。這種將西湖擬成佳人的手法，亦見於〈南歌子·錢塘端午〉詞中：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菰黍連昌歎，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元祐五年端午，頁 613)

他將眼前所見的西湖譬喻為明眸流轉的歌女：湖中孤山是美人翠碧的黛眉，而輕風吹拂的湖面則是美人流盼的秋波。於是，西湖被人格化為一位風情萬種、溫柔美麗的佳人，展露出親切多情的山水風韻。詞中還如實地指出杭民最喜歡遊覽之處為西湖北山的名勝「十三樓」³⁶，蘇軾守杭時也經常辦公於此，全詞洋溢著作者

³¹ 西湖三面環山，南有天竺山、龍井山、南高峰、玉皇山、鳳凰山、吳山等山脈（統稱南山），北有靈隱山、北高峰、葛嶺、寶石山等山脈（總稱北山）。參〔宋〕周密：〈湖山勝概〉，《武林舊事》，卷 5，頁 91-123。

³² 〔宋〕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蘇軾詩集》，卷 13，頁 644。

³³ 《蘇軾詩集》，卷 9，頁 430。

³⁴ 王文誥云：「此是名篇，可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公凡西湖詩，皆加意出色，變盡方法。」見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其二〉案語，《蘇軾詩集》，卷 9，頁 430。

³⁵ 《蘇軾詩集》，卷 33，頁 1749。

³⁶ 「十三樓」在西湖的北山，吳自牧：〈西湖〉，《夢梁錄》，卷 12 云：「大佛頭石山後名十三間樓，乃東坡守杭日多游此，今為相嚴院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頁 174。周密：〈湖山勝概·葛嶺路〉，《武林舊事》亦云：「十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卷 5，頁 114），由於有觀覽之勝，因而蘇軾經常在此辦公，杭民亦喜遊此。

登臨游賞西湖湖山、與民同樂的歡樂氣氛。

就錢塘江言，其每年八月十五至十八的海潮，為天下奇景，³⁷自古以來即吸引大批人潮前往觀賞，然而柳永〈望海潮〉僅以「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誇飾其翻騰的潮勢，至於潘閔〈酒泉子〉則對「觀潮」有較詳細的描寫：

長憶觀潮，滿郭人爭江上望。來疑滄海盡成空。萬面鼓聲中。 弄濤兒
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溼。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其十，《全
宋詞》，頁6）

潘氏以大半的篇幅直接敘寫觀潮的盛況與弄潮兒踏浪爭雄的驚險，能與《夢梁錄》的記載相互印證：

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涼傘、紅綠小傘兒，各繫繡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為群，執旗泗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³⁸

一群為了矜誇弄潮特技的泳者，手持各色各樣的旗子、小傘、竿子，冒著生命危險逆潮踏浪、不讓紅旗被浪打濕，只為博得觀眾的喝采。潘、吳二氏描寫的共同點為：作者皆站在客觀的立場書寫，因此景自景、人自人，作者本身與弄潮兒的距離較遠；但親切開朗的蘇軾則不然，他從當權者的主觀立場書寫觀潮，並將自己置身其中，更增添詞中情味，〈瑞鷓鴣·觀潮〉云：

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斜。儂欲送潮歌底曲。尊前還唱使君詩。

³⁷ 這種能捲起滔天巨浪的錢塘潮奇觀，其起因為「錢塘江入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而江身小，起潮時，海水從寬達一百公里的江口湧入，受兩旁漸窄的江岸約束，形成湧潮。湧潮後又受江口攔門沙坎的阻攔，波濤後推前阻，漲成壁立江面的一道水嶺」。伊永文：《宋代城市風情》（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5-106；尤其在中秋前後，太陽、月亮、地球剛好在一條直線上，對海水的引力特別大，錢塘潮也最為巨大，杭人因而習慣在八月十五到十八日間舉行觀潮盛會。

³⁸ [宋]吳自牧：〈觀潮〉，《夢梁錄》，卷4，頁52。

(熙寧六年八月，頁 37)

蘇軾以高大的「碧山」譬喻海潮潮頭之高，以經常醉酒的「山簡」譬喻自己的形象；並藉著踏浪兒的口吻敘說其弄潮的自信、對岸邊蘇軾醉態的嘲笑、高歌太守之詩以表敬意，因而更親切地表現出弄潮者與觀潮者（含通判蘇軾與太守陳襄）間密切互動的歡樂氣氛，呈顯出與潘、吳二氏完全不同的書寫手法與風格。在這幅特寫弄潮與觀潮的生動熱鬧畫面中，充分體現出蘇軾一種放下官員身段、與民同樂的親切形象。

(2) 呈顯娛樂姿態之豐富：

蘇詞中對於杭州文士官員及一般民眾的娛樂姿態均有生動的描繪。詞是依傍都市文化娛樂而存在的，故能反映都市的各種娛樂形式。由於北宋相對穩定的社會局勢，城市經濟的快速繁榮和青樓妓館的大量增加，再加上朝廷提倡官吏「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³⁹，因此，寄情聲色、歡宴冶游的士大夫娛樂之風遂愈來愈盛，儼然成為北宋太平與富庶的標誌與象徵。自古繁華的杭州，更是「紅樓鱗次、越艷雲集之鄉」⁴⁰，才名遠播的蘇軾來到這名臣賢士薈萃之地，大小公私的宴會自然是應接不暇，如《西湖游覽志餘》云：「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倅杭為酒食地獄」⁴¹，於是，此時蘇軾的應歌之作中便反映出文士筵席上歌妓佐酒、聲色飲宴的娛樂姿態，如：

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與韋郎看。莫便向姑蘇。扁舟下五湖。(《菩薩蠻·杭妓往蘇迓新守楊元素，寄蘇守王規父》，熙寧七年七月，頁 71)

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畫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菩薩蠻·述古席上》，熙寧七年七月，頁 76)

³⁹ [元]脫脫等：《石守信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卷 250，頁 8810。

⁴⁰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頁 38。

⁴¹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 21，頁 741。

《西湖游覽志餘》曾針對這兩闕詞云：「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鱗鴻往返，覩不為異。……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略)。又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云：(略)。」⁴²可見出歌妓在文士官員的迎送飲宴之間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前首記錄了當時赴任、迎任以官妓為導的風氣：「玉童」、「浮丘伯」分別喻指杭妓、新守楊繪，「韋郎」則以曾任蘇州刺史的韋應物借指當時的蘇守王規父。由於杭妓前往蘇州真正的目的是迎接杭州新守，她們在蘇州歌舞，僅是借給蘇守看看而已；因此，蘇軾借范蠡攜西施游五湖、一去不返的典故，戲嘲蘇守莫想留住美麗的杭妓，字裏行間透露出迎接新守的愉悅心情。後首則運用「代言體」，藉諸妓之口寫出送別太守陳襄的不捨之情，尤其「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二句，明顯地是對女性的描寫，可知在西湖的送別席間，一群官妓亦參與了這場活動。此外，還有「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尊、收淚唱陽關」(〈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頁78)、「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勸金船·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頁87)等宴飲場景，亦可見這種聲色佐酒的娛樂姿態描寫。

又蘇軾倅杭時，與官員文士們有一極特別的娛樂活動，曾引起全城百姓的注意，其〈瑞鷓鴣·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云：

城頭月落尚啼鳥。朱艦紅船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漾雙鳧。
映山黃帽螭頭舫，夾岸青煙鷓尾鑪。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熙寧六年寒食，頁28)

寒食日天尚未明之時，蘇軾與錢塘縣令周邠、仁和縣令徐疇先至湖上等候太守陳襄。這是一場在西湖朝食、泛舟的邀約活動，《西湖游覽志餘》曾詳載此事：「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朝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⁴³，可知此一官員文士的社交娛樂，在當時造成了轟動，連杭城民眾都夾道觀看熱鬧，竟

⁴² 同前註，卷16，頁305。

⁴³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10，頁589。其中「守」字恐為「倅」之誤，因其為蘇軾熙寧六年倅杭之事。

也成為杭民特殊的娛樂活動。

鬥茶，亦是宋代貴官宴席間常見的娛樂型態。〈行香子·茶詞〉云：

綺席纔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鬪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却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元祐四年秋，頁 599）

「鬪贏一水，功敵千鍾」，是蘇軾與廖正一（字明略）鬥茶場面的描述。蔡襄《茶錄》言鬥茶之法為：「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⁴⁴，詞中蘇軾以「一水」之差勝過明略，並言此御賜之密雲龍茶能解酒，其功效更勝千鍾之酒，可以見出「鬥茶」為蘇軾及賓客帶來了不少樂趣。

至於一般杭民的娛樂活動，則多發生於民俗節慶的遊賞與飲宴。例如上元節時，遊賞的人潮從白天到黑夜皆不間斷，〈木蘭花令〉云：

元宵似是歡遊好。何況公庭民訟少。萬家遊賞上春臺，十里神仙迷海島。平原不似高陽傲。促席雍容陪語笑。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拚醉倒。（元祐六年上元，頁 648）

元宵遊賞的人潮有「萬家」之眾，蘇軾亦側身其中，由於心情輕鬆愜意，因此，連自己也不禁對此海島迷戀不已。「何況公庭民訟少」，則指出其心情愉悅是因為此時「三圍皆空」⁴⁵，民生安定，對自己的政績感到滿意。下片藉平原君的形象喻寫自己從容溫和的官員形象，更以「玉山醉倒」喻寫民客為他拚醉倒地的坦率熱情，具寫出自己與民同樂的親民形象。全篇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元宵白日杭守蘇軾與杭民「雅俗共賞」、歡宴冶遊的娛樂場景。其實，元宵娛樂活動的高潮，仍在夜間的賞燈活動，〈蝶戀花·密州上元〉：

⁴⁴ [宋]蔡襄：〈論茶·點茶〉，《茶錄》上篇，載蔡襄：《荔枝譜（外十四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 83。

⁴⁵ 蘇軾：〈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詩題，《蘇軾詩集》，卷 32，頁 1722-1723。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⁴⁶ 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熙寧八年上元，頁 140）

這是蘇軾離開杭州後，第一次在密州過元宵節時，追憶杭州元宵盛況之作。錢塘的元宵夜，家家張燈結綵，十五夜月正圓，滿城仕女，爭相遊賞這燈月交輝的華麗景象，《武林舊事》言：「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⁴⁷，證明了詞中以「畫」喻人的生動貼切；《東京夢華錄》「元宵」亦云：「寶騎駸駸，香輪輾輾，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⁴⁸，亦印證了無論是街上或室內，杭州的上元夜處處呈現著笙歌並作、民眾集聚的冶遊盛況。

又如〈南歌子·錢塘端午〉：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菰黍連昌歌，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元祐五年端午，頁 613）

實寫出端午時杭民的娛樂活動除了應俗的吃粽子及飲菰蒲酒外，主要的還是在遊覽「十三樓」。「十三樓」在西湖的北山，《夢梁錄》云：「大佛頭石山後名十三間樓，乃東坡守杭日多游此，今為相嚴院矣」⁴⁹，《武林舊事》亦云：「十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⁵⁰，在蘇軾及杭民眼裏，其觀覽之勝較揚州名勝「竹西亭」更勝一籌，因此不僅蘇軾經常辦公於此，杭民更喜來此遊賞登覽。末二句更化用杜牧〈揚州〉詩句：「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⁵¹（三首之一），以美妙的歌聲表現出杭民遊之不倦、至

⁴⁶ 「此般風味應無價」，一作「更無一點塵隨馬」。見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卷 1，頁 33。

⁴⁷ [宋]周密：〈元夕〉，《武林舊事》，卷 2，頁 42。

⁴⁸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元宵〉，《東京夢華錄注》（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卷 6，頁 181。

⁴⁹ [宋]吳自牧：〈西湖〉，《夢梁錄》，卷 12，頁 174。

⁵⁰ [宋]周密：〈湖山勝概·葛嶺路〉，《武林舊事》，卷 5，頁 114。

⁵¹ [清]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卷 522，頁 5963。

晚不歸的遊興。詞中以極大篇幅寫杭人在「十三樓」歡唱冶遊的娛樂姿態，呈顯出杭州的繁華與昇平氣象。

(3) 刻劃節序風俗之繁盛：

蘇軾還能突破潘、柳、張等詞家杭州書寫的局限，首先將杭州節序風俗入詞。此類詞作，多作於其守杭之時，所謂「觀民風，察時態」⁵²，他身為百姓父母官，憑著滿腔親民愛民的熱情，以其靈慧的心眼對風俗民情所作的體察，即便能與雜記所載相互印證，卻仍呈顯出異於雜記的視角與情調。雜記重在客觀呈現民情風俗的全部內容，卻不帶有作者的感情色彩；蘇軾則選擇最能呈現節慶特色的習俗與活動加以特寫，再穿插自己與民同樂的形象，或是抒發當時的感觸。詞中對杭州元宵、端午、七夕、重九等習俗皆有刻劃，這些習俗雖與其他地方無太大差異，但無論是杭州的官員或百姓，在佳節歡會中總是不放棄鮮衣美食、對時行樂的機會，⁵³蘇詞中頗能凸顯出杭州此時的「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⁵⁴，亦展現出杭人「競豪奢」(柳永〈望海潮〉)的風俗。

元宵又稱上元或元夕，宋人最重此節，身為太守的蘇軾也不例外，不僅參與了伽藍的上元法會，並與友朋飲酒作樂、歡慶佳節，〈浣溪沙〉云：

雪領霜髯不自驚。更將翦綠發春榮。羞顏未醉已先頰。莫唱黃雞并白髮，且呼張丈喚殷兄。有人歸去欲卿卿。(元祐六年上元，頁 641)

傅注本題注云：「公守湖。辛未上元日，作會於伽藍中，時長老法惠在坐。人有獻

⁵² [元]脫脫等：〈禮志〉，《宋史》，卷 66，頁 2698-2699。

⁵³ 杭州經濟的繁榮，造就了此地豪奢的風俗。〈地理志四〉，《宋史》載兩浙路：「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卷 88，頁 2177。)；蘇軾亦指出：「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蘇軾文集》，卷 48，頁 1402。)；〈八日祠山聖誕〉，《夢梁錄》亦云杭民：「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兒，帶妻挾子，竟日嬉游，不醉不歸。此邦風俗，從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 1，頁 14。

⁵⁴ [宋]張炎：《詞源》，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頁 212。

翦伽花綵甚奇，謂有初春興。因作〈浣溪沙〉二首，寄袁公濟⁵⁵，可知其場景在僧院之中，而法惠長老亦在座。詞中只選取「翦綵」這一能發初春之興的習俗加以發揮，「翦綵」所用的材料為綵帛或綵紙，是吳楚一帶人日及立春的習俗，宗懔《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翦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云：「立春之日，悉翦綵為鷲以戴之」⁵⁶；蘇軾也入境隨俗地頭戴「翦綵」，卻因覺與自身年齡頗不相稱而臉紅。下片引白居易之詩，⁵⁷在「歸去卿卿」的戲謔之語中，暗示了應學習居易不悲老大、與老友呼丈喚兄地共渡佳節的人生態度。在短短的小令形式中，不僅涵納了元宵節慶的特殊習俗，也形象而幽默地描繪了蘇軾與杭民節慶歡宴的熱鬧氣氛。

端午節又稱「浴蘭令節」。城中人家鋪陳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於門首，以粽子、茶酒、時果供養。⁵⁸賽龍舟、吃粽子、飲菖蒲酒，皆為民間流行的節慶習俗。蘇詞中對杭州端午習俗的記述，集中在吃粽子、飲酒兩項，〈南歌子·錢塘端午〉下片：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菰黍連昌歌，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元祐五年端午，頁 613）

端午這天，粽子（「菰黍」）與菖蒲酒（「昌歌」）應俗地陳列在杭人歡慶佳節的宴席之上，無論是太守蘇軾，或是一般百姓，都盡情地狂歡暢飲。楊慎評此詞：「端午詞多用汨羅事，此獨絕不涉，所謂善脫套者」⁵⁹，稱讚蘇軾能不落俗套，避用屈原投江之事；此詞專取美景、美食、美聲以寫端午，在實寫實繪之中，具體鮮活

⁵⁵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頁 642。

⁵⁶ 以上二條資料分別見〔南朝·梁〕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 52、63。

⁵⁷ 詞中云：「且呼張丈喚般兄」，乃引用白居易〈歲日家宴，戲示弟侄等，兼呈張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詩：「形骸潦倒雖堪嘆，骨肉團圓亦可榮。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般兄。」清聖祖：《全唐詩》，卷 447，頁 5049。白居易中年後遭貶為江州司馬，後來雖被召回長安，但又目睹宦官專權，黨爭劇烈，為避禍計，遂要求外任杭州等地刺史，終得辭官居洛陽。此等遭遇，與東坡為避免朝中政爭、禍及自身，而乞求外放杭州的遭遇極為類似。

⁵⁸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端午〉，《東京夢華錄注》，卷 8，頁 210。

⁵⁹ 不著撰人，楊慎批點：《草堂詩餘》，卷 1，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205 冊，頁 286。

地呈顯出杭州端午的民俗特色及愉快氛圍。

至於七夕，乃由牛郎織女的故事而來，因此一直是個浪漫的節日，《荆楚歲時記》載有此日習俗：「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鑰石為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符應」⁶⁰，到了宋代，此一民俗活動更加熱鬧、侈靡，《東京夢華錄》云：

七夕前三、五日，車馬盈市，羅綺滿街，旋折未開荷花，都人善假作雙頭蓮，取玩一時，提攜而歸，路人往往嗟愛。又小兒須買新荷葉執之，蓋効顰磨喝樂。兒童輩特地新粧，競誇鮮麗。至初六、七日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花、瓜、酒、炙、筆、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尚。⁶¹

七夕前一天，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至七日夜，婦人女子對月穿針，餽釘杯盤，飲酒為樂，謂之「乞巧」。又以小蜘蛛貯於盒內，以候結網之疏密圓正，若是，則為「得巧」。蘇詞亦特寫七夕之俗，〈鵲橋仙·七夕和蘇堅韻〉云：

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沱漢漾。與君各賦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綵舫。（元祐五年七夕，頁 618）

蘇軾與下屬蘇堅利用七夕歡宴，席間不僅飲酒唱和，也以兒童遊戲般的快樂心情欣賞著杭民為「乞巧」而結製的「朱樓綵舫」。此詞迥異於以往七夕詞多寫男女相會之事，而能別出新意，在發抒思鄉之情後，以「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的曠達胸襟超脫人世桎梏，表現了節慶與友賦詩的歡樂氣氛及蘇軾特有的超然形象。

九月九日重陽節，又稱菊花節，市民主要的活動為登高賞菊，還有佩茱萸以

⁶⁰ [南朝·梁]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頁 194。

⁶¹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七夕〉，《東京夢華錄注》，卷 8，頁 215。

祛邪避災，飲菊花酒以求長壽等習俗。⁶²蘇軾〈浣溪沙·菊節別元素〉有「菊花人貌自年年」(頁 92)，〈浣溪沙·重九〉有「茱萸仔細更重看」(頁 93)，紀錄重陽賞菊、佩茱萸的習俗；另有和蘇堅之詞，描述重九當日與友人「登高」的活動：

我輩情鍾，古來誰似龍山宴。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箏聲遠。鬢雲亂。愁入參差雁。(〈點絳脣·己巳重九和蘇堅〉，元祐四年，頁 609)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還高宴。江村海甸。總作空花觀。尚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年年雁。(〈點絳脣·庚午重九再用前韻〉，元祐五年，頁 625)

由題序與「龍山宴」、「高宴」等詞語，可知蘇軾守杭的兩次重九，皆與僚屬兼好友蘇堅一同應俗地登高飲宴、賞景歌詠；還可由「佳人」、「箏聲」、「鬢雲」等詞語，知有歌妓佳人作陪。重九詞向來不脫登高懷友或懷鄉的主題，但蘇軾卻從重九登高避災、祈求長壽的習俗中，引發對人世變幻無常、富貴名利難駐的感慨，別具靈心慧思。

(4) 特寫多種人物之風采：

蘇詞杭州書寫突破前輩詞家之處，還表現在對杭州人物風采的特寫，從官員到歌妓、從禪師到侍妾，皆有生動的形容描寫，呈顯了杭州城市生活的多種樣貌。如寫福建轉運判官「曹輔」：

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后土祠中玉蕊，蓬萊殿後鞦韆。此花清絕更纖穠。把酒何人心動。(〈西江月·真覺賞瑞香三首〉，頁 654)

小院朱闌幾曲，重城畫鼓三通。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翠袖爭浮大白，阜羅半插斜紅。燈花零落酒花穠。妙語一時飛動。(〈其二·

⁶² 參〔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 20，頁 7-8。

坐客見和，復次韻》，頁 657)

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記吳風。繼取相如雲夢。 點
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知君却是為情穠。怕見此花撩動。(〈其三·
再用前韻戲曹子方〉，元祐六年三月，頁 658)

這三首詞記述蘇軾與曹輔一同在龍山「真覺院」⁶³賞瑞香花時，曹輔將瑞香花誤為紫丁香、被蘇軾嘲笑的趣事。「公子」指作者的好友曹輔，字子方；「老夫」指蘇軾自己。第一首先言此花的清香穠艷，令人心動；次首描述宴席間熱鬧的賞花唱和；末首則以擬人手法戲稱珍貴的瑞香花怨泣之因，乃是曹子方寫詩時誤將其當作平凡的「紫丁香」揚名出去所致，在遊戲之中，既凸顯出曹輔的迷糊個性，也流露了蘇軾幽默爽朗的性格。但緊接著蘇軾又為友人辯護，「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指出子方乃因醉中提筆方有此誤，且其已為「謗花」而面有慚紅，從中表現出作者與子方的深厚友誼。

寫歌妓者，如〈菩薩蠻·歌妓〉：

繡簾高捲傾城出。燈前激灩橫波溢。皓齒發清歌。春愁入翠蛾。 悽音
休怨亂。我已無腸斷。遺響下清虛。纍纍一串珠。(熙寧六年夏，頁 35)

首句以側筆烘托歌妓的「傾城」之姿，再以「激灩橫波溢」正面特寫其眼波流轉的明媚動人。「皓齒發清歌」直寫其歌聲之美，「春愁入翠蛾」則以愁鎖眉頭形象化地寫出她舞蹈的神韻。「悽音」、「怨」、「無腸斷」更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中，表現出歌妓歌聲之撼動人心及蘇軾對其卑微地位的同情。

寫禪師者，如〈南歌子〉：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眼。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南
歌子〉，元祐五年，頁 637)

⁶³ [明]田汝成：「慈雲嶺之南，為龍山。……龍山稍北為玉厨山、善慧禪寺，……寺傍舊有真覺院。」《西湖游覽志》，卷 6，《叢書集成續編》，第 63 冊，頁 348-351。

大通禪師是位「操律高潔」⁶⁴的法師，人欲見之，必須齋戒沐浴方能登堂，女人更是不准進入他的房間。釋惠洪《冷齋夜話》載：「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慍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⁶⁵，蘇軾竟敢如此毫無顧忌地帶歌女入寺，破壞他的清規，詞中「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眼」，便生動地描寫了大通禪師當時的窘態；但當蘇軾作了這首極富妙趣的〈南歌子〉令該妓歌之後，大師竟也為之解頤。由此可見大師的通融及蘇軾的詼諧。

寫侍妾者，如〈江城子·陳直方妾嵇，錢塘人也。丐新詞，為作此。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余嘗作數絕以紀其事矣〉：

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閱新鰥。拭餘潛。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春盡也，聞舊曲，破朱顏。（熙寧六年九月，頁42）

全篇傾注於杭州司戶陳珪（字直方）之妾（錢塘人）美貌、舞姿與多情的描寫。她有著如「玉」般的容貌，杭州「十里」之內的女子皆不如其美；而其「弓彎」之舞姿更令門外行人「立馬」觀賞、不忍離去；最難能可貴的是，她為直方新喪正室而拭淚的多情性格。詞末，蘇軾還以〈陌上花〉曲中吳越王妃每春必歸臨安的典故，⁶⁶安慰即將隨直方罷官歸鄉、離開錢塘的她今後仍有回杭州的機會，可以見出蘇軾對女性心理的細微體察與關注。

⁶⁴ [明]田汝成：〈方外玄蹤〉，《西湖游覽志餘》，卷14，頁653。

⁶⁵ [宋]胡仔：〈戲詞〉引，《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卷57，頁393。

⁶⁶ [宋]蘇軾〈陌上花三首並引〉：「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見《蘇軾詩集》，卷10，頁493。

三、居杭心境書寫——以「蘇軾」為中心的考察

（一）杭州與蘇軾的個人情志

大自然的山水草木各有其魅力，足以「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⁶⁷，正如英人李斯托威爾所說：「誰會認真地反對那為歷代詩人所歌頌的、無休無止的、變化無窮的大海（無論是當它靜靜地反映著藍天的靜穆，或者被風暴捲起驚濤駭浪）那種無可比擬的不可抗拒的美呢？又有誰反對過皚皚積雪、經年不化的孤聳的高峰的美呢？反對過旭日東升火紅一片、夕陽西下霞光萬道的美呢？」⁶⁸當審美主體敞開感官、鬆弛神經來觀賞自然美景時，能夠從江山風月中陶冶自我的情性，消解內心的鬱悶，得到心靈的慰藉，進而達致「靜觀物我，認取性靈，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⁶⁹的閒適心境。熙寧四年，蘇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二次上書宋神宗，力陳新法弊病，而被安石黨徒所忌，遂自請補外，擔任杭州通判。時年僅三十五，仍處於參政的「上升時期」⁷⁰，心中難免有著「何日功名遂了」（〈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頁90）等功名未遂的政治失意之感，但清幽出塵的杭州山水撫慰了他因外放而略顯低沉的心靈，使其能從杭州山水的審美中獲致閒適自得的悠然心境。如〈減字木蘭花〉（雙龍對起）就多方調動了視覺（挺立的古松、輕落的花葉及晝夢的幽人）、嗅覺（微香的疏影）、觸覺（清軟的湖風）、聽覺（爭噪的雙鶻）等感官來寫其所觀賞的西湖湖邊清幽宜人之景，在清空靜寂的景致描寫中，彷彿已將政治失意之感消解在眼前的怡人山水中了。此時蘇軾將全部身心都投入自然的懷抱，除卻了利欲之念與塵垢之思，其主觀心境與杭州山水的客觀物境渾然妙合，是一片清朗開闊、閒適瑩潔，即如錢鍾書所言「我心如山水境」，其審美心理為：

⁶⁷ [晉]王羲之：〈蘭亭集序〉，載巴壺天、戴培之編：《兩晉南北朝文彙》（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年），頁2071。

⁶⁸ 李斯托威爾著，蔣孔陽譯：《近代美學史評述》（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頁183。

⁶⁹ [明]高濂：〈起居安樂箋〉，《遵生八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3年），上卷，頁192。

⁷⁰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頁63。

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為映發也。……要須流連光景，即物見我，如我寓物，體異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對而觀賞；情已契，故物如同我哀懷，可與之融會。⁷¹

由於審美主體（蘇軾）能敞開審美心胸（即「閒」的心胸），故能在觀賞杭州出塵靜美的山水景物時，將自己納入生生不息的大化中，由此消除了物我的界限，在物我相融相契的境界中，映照出與山水相同的恬淡心境。

杭州充滿生命力的山水之美，更激發蘇軾的想像力，使其從中領悟真意，找到更深刻的自我。如〈臨江仙·風水洞作〉一開頭就以「四大從來都遍滿」的佛家觀點，來詮釋風水洞所以得名之由。佛家以地、水、火、風為「四大」，是萬事萬物的源頭活水，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當蘇軾面對「風水洞」中的「風」、「水」時，是將之視為一種「生命化意象」(animating imagery)，傅樂生解釋這種意象為：

把自然界看作充滿生命或精神的有機體，能隨時激發我們的想像力，以便跟它對應或對話。⁷²

正因為蘇軾把「風水洞」的風與水看作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所以激發了無比的想像力，以一種超越靈視的感受，⁷³在與大自然的冥合妙會中領悟「忘言」的意趣，找到更深層的自我內在：「層巔餘落日，草露已沾衣」，隱隱流露出如陶淵明般「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超脫自在。

然而，二次仕杭的蘇軾，在杭州山水的描寫之中，卻多了一些孤獨之感與對人生有限性、虛幻性的思索，如：

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春弄袖，明月夜聞蕭。……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

⁷¹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53。

⁷² 傅樂生著，鄧仕樑譯：〈中國山水詩的起源〉，中大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委員會編譯：《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3年），頁113-114。

⁷³ 米勒：「詩人對自然景物的感受往往導向一種超越靈視的獲取，並傾向於仔細描述此一靈視的確實本質。」（James Whipple Miller,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Chinese Nature Poet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4 [Summer 1972], p. 216）。

宵。(《臨江仙·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元祐五年二月，頁 611)

佳節連梅雨，餘生寄葉舟。……更有明月千頃、一時留。(《南歌子·湖景》，元祐五年五月，頁 616)

閒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清風明月我。(《點絳脣·杭州》，元祐五年秋，頁 630)

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吹墮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棹小舟歸去，任煙波飄兀。(《好事近·湖上》，元祐五年九月，頁 633)

而今楚甸。戲馬餘飛觀。顧謂佳人，不覺秋強半。箏聲遠。鬢雲吹亂。愁入參差雁。(《點絳脣·己巳重九和蘇堅》，元祐四年九月，頁 609)

江村海甸。總作空花觀。尚想橫汾，蘭菊紛相半。樓船遠。白雲飛亂。空有年年雁。(《點絳脣·庚午重九再用前韻》，元祐五年九月，頁 625)

元祐四年，個性耿直、堅持己見的蘇軾，與諸多台諫大臣不合，身處在複雜矛盾的人事紛爭之中，深覺不安於朝，遂決定離開京師，當時他已是年過五旬之人，再加上經歷了烏臺詩案的打擊與人間離別的悲傷，情感上已由外發明快轉為沈澱內斂。此時，面對杭州的山水清景，透顯出一種江海為家、遁離人世的孤獨心境，以及對生命有限、富貴虛幻的人生感慨。

可貴的是，樂觀的蘇軾並沒有一味地沉溺於早生華髮、人生如寄的憂愁之中，而能努力地求得心靈的超越和昇華；尤其在面對錢塘海潮的雄偉景象時，特別能馳騁其想像力，興發出自由浪漫的人生哲思，艾狄生曾闡發這種獲之於偉大景物的審美心理說：

吾人之想像喜好填滿了物象，或喜愛攫住任何超乎能力以外的東西。面對此類遼闊之景象，吾人深感愉悅的驚愕；且在悟解其存在時，靈魂感到歡愉的平靜和驚訝。很自然地，人之心靈憎惡看似受了拘束的事物；若景物

被圈限於一狹小範圍，且由於鄰近城牆或山脈而變得短小，它必會設想，以為已受到某種拘束。反之，寬坦的地平線意指自由，眼睛可在其上之空間遠遠徜徉，盡情漫遊，且沈醉在繽紛的景物中。對想像而言，這種廣闊未受規範的景色是可喜的，就如同對認知而言，思索永恆或無限是可喜的一樣。但是，若有美或不尋常的東西跟這種壯偉連起來，如遭受風雨侵襲的海洋，天空佈滿星星或者一幅風景分成溪流、樹林、岩石以及綠茵，則樂趣會更無窮，因為它是源自多個原則也。⁷⁴

因此，原本就具有遼闊視野的錢塘江水，在受到風與潮汐作用等影響而形成海潮奇觀時，其壯偉的景象，更激發了蘇軾對自由的審美想像，如〈八聲甘州·寄參寥子〉：「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頁 668），雖然多變、無情的錢塘江水使他感嘆人間聚散之多變與時間的無情，但卻由潮來潮往的壯偉景觀中思索了宇宙永恆、人生有限的現實課題，領悟了不必懷古傷今，宜把握當下，消除機心，讓心靈恬淡自適才是。〈南歌子〉更妙用「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等各種神話想像來形容他所見海潮上下翻騰的雄偉多變，在遼闊、不受規範的視野中，以眼前不尋常的壯麗美景作為一象徵，⁷⁵寄寓其急欲超脫生命桎梏的自由之想，揭示出「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等自在的人生歸宿。杭州奇麗宏偉的山水，對解放蘇軾拘束的心靈、達致超脫曠達之境，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二）杭州與蘇軾的友朋之情

蘇軾居杭時期交游廣闊、社交頻繁，與杭州的山水風情、地理交通、經濟狀況皆有極密切的關係。歐陽修〈有美堂記〉稱：「臨是邦（指杭州）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

⁷⁴ Joseph Addison, "The Spectator": 412,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d. Walter Jack Bate (Rpt. Taipei: Yeh Yeh Book Gallery, 1968), p. 184.

⁷⁵ 韋勒克指出：「想像力是一種創造力，詩人的心靈即以此得以洞察現實，並把自然作為一象徵來看待，象徵某些隱藏於自然背後或者自然之內日常不易感受到的東西。」（Rene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Ed. S. Nichols. New Haven: Yale UP, 1967.）

極遊覽之娛」⁷⁶，可知杭州獨特的山水形勝，自古以來即吸引著眾多的朝臣文士，蘇軾的友人如張先、魯有開、陳舜俞等亦因此常與之相聚，同賞杭州美景（〈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勸金船·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甚至在此形成了以張先為中心的文人社交界。⁷⁷

至於杭州地理交通與經濟的發展，則奠基於隋煬帝時竣工通航的江南運河（京口至杭州），不僅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便利了南北經濟、文化和技術的交流，更促進了杭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唐時極重視水利建設（如：興建沙河塘），則使得杭州的農業、手工業和城市日益繁榮，也吸引了日本、高麗、大食（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來往於此，錢塘江口遂成沿海貿易集散地，杭州已成「咽喉吳越，勢雄江海，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⁷⁸的繁華名郡；⁷⁹五代吳越王錢鏐的定都杭州，更使杭州一躍而為吳越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加上主政者對錢塘江的防治和疏浚，又大大促進海運和河運交通的發達，使得杭州成為商賈、使者「揚帆越海，貢奉無闕」⁸⁰的運輸繁忙地區，錢氏又採「保境安民」之策，使得杭州能夠避開戰禍，發展成東南最繁華富庶、人文薈萃之邑。⁸¹到了北宋，商業性城市高度發展，市民階層亦隨之形成，杭州亦發展成這種繁華的城市，不僅有犀角、象牙、鮫綃、翡翠、珠貝等海外奇珍，連人口亦逾二十萬戶之多，⁸²博得「地上天宮」⁸³的美譽。因此，杭州這種居於南北交通咽喉的地理

⁷⁶ [宋]歐陽修：〈有美堂記〉，頁280-281。

⁷⁷ 日人村上哲見推測：「當時在這個地方（湖、杭）已經形成了以張子野為中心的愛好詞的文人社交界，而作為詞人的東坡是從加入這一社交界而走上詞壇的。」見[日]村上哲見著，楊鐵嬰譯：《唐五代北宋詞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75。

⁷⁸ [唐]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董誥等輯：《全唐文》（臺北：啟文書局，1961年），卷316，第7冊，頁8。

⁷⁹ 以上關於隋唐時杭州發展的敘述，參林正秋：〈隋唐時期杭州都市的興起與發展〉，收於林正秋等：《古代杭州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學院出版社，1981年），頁68-73。

⁸⁰ [宋]薛居正等：〈錢鏐傳〉，《舊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卷133，頁1771。

⁸¹ 以上關於五代時杭州發展的敘述，參徐規、林正秋：〈五代十國時期的杭州〉，收於林正秋等：《古代杭州研究》，頁74-81。

⁸² 北宋中期的《元豐九域志》載杭州戶數為「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可知宋神宗時的杭州共有二十萬二千八百一十六戶。見[宋]王存等：〈兩浙路〉，《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5，頁207。

⁸³ [宋]陶穀評價杭州說：「輕清秀麗，東南為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為甲。百事繁庶，地

位置，就大大便利了蘇軾友人的造訪，如江公著由京師出守吉州、順汴河東下欲回桐廬探家時，便先取道杭州探視蘇軾，然後才溯衢江經衢州入贛（〈漁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又如錢勰罷越守北歸時，亦途經杭州，滯留會晤蘇軾（〈臨江仙·送錢穆父〉）。同時，隨著交通發達而發展的經濟榮景，又使得杭州成為聲色娛樂豐富的繁華城市，在這樣的風氣影響之下，蘇軾與友人以歌妓佐酒的宴會社交就變得格外頻繁，例如蘇詞中記錄與杭州太守陳襄的聚宴就達八首⁸⁴之多。

蘇軾兩度仕杭，詞中往來贈答或為之特寫的友人，有陳襄、楊繪、蘇堅、江公著、葉淳老、錢勰、錢穆父、項長官、梅庭老、袁公濟等文士官員；以及隱居西湖「湖山勝處」的僧人如清順、參寥子、大通禪師等⁸⁵。熱情多情的蘇軾，在迷人的杭州風景中，與這些雲集杭州的名臣、賢士、僧人形成了「新官舊官相仍，故友初交相續」⁸⁶的密切交游網絡，而杭州秀麗的地景亦儼然成為蘇軾與友朋間友誼的凝聚地與催化劑，其詞中有藉相聚地美景寫與友朋的相契之情，如：

儂欲送潮歌底曲。尊前還唱使君詩。（〈瑞鷓鴣·觀潮〉，熙寧六年八月，頁37）

……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尋常行處，題詩千首，繡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行香子·丹陽寄述古〉，熙寧七年正月，頁45-46）

還與去年人，共藉西湖草。（〈卜算子·自京口還錢塘，道中寄述古太守〉，

上天宮也。」見〈地理門〉，《清異錄》，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7冊，頁842。

⁸⁴ 即〈瑞鷓鴣·觀潮〉、〈虞美人·為杭守陳述古作〉、〈訴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菩薩蠻·述古席上〉、〈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菩薩蠻·西湖送述古〉、〈清平樂·送述古赴南都〉、〈南鄉子·送述古〉等八首。

⁸⁵ [宋]葉夢得：「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所居皆湖山勝處。」〈文學類·故事〉，《避暑錄話》，卷下，《叢書集成新編》，第84冊，頁638；又，田汝成：〈方外玄蹤〉，《西湖游覽志餘》：「（蘇軾）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為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卷14，頁653。

⁸⁶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頁38。

熙寧七年三月，頁 52)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知陳州；他曾向神宗推薦蘇軾，熙寧五年五月調知杭州，又成為蘇軾的上司，兩人十分投契，經常攜手同遊杭州的山水。蘇軾與他的「尋常行處」是觀潮的錢塘江邊，西湖湖畔的草地、望湖樓、湧金門，以及湖中的孤山寺，這些杭州地景都是見證他倆友誼的湖山美景。作者還特別並置「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等兩人最常題詠的優美意象，在人格化的描寫中，透顯出與陳襄同游勝景的深切回憶以及對兩人相契友情的無限珍惜。又如：

閒倚胡牀，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別乘一來，有唱應須和。還知麼。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點絳脣·杭州〉，元祐五年秋，頁 630)

袁穀字公濟，元祐四、五年間倅杭，經常與太守蘇軾登山玩水。蘇軾詞中特寫與之共享杭州清風明月的湖山之樂，且對於能消除一己孤寂的友人的到來，表達了一種相契共鳴的歡迎之意。又如：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記取西湖西畔，正暮⁸⁷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八聲甘州·寄參寥子〉，元祐六年三月，頁 668)

這是元祐六年三月六日，蘇軾離杭前三天寫贈參寥子之詞。⁸⁸參寥子為其摯友，不僅最了解他的「許國深哀」⁸⁹，在其貶居黃州時，還曾不遠千里相從，因此詞中言

⁸⁷ 「暮」，一作「春」。見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卷 2，頁 56。

⁸⁸ 此詞寫作時間有五種不同的說法，本文依陳新雄先生的考辨結果：採取王水照的說法。詳見劉昭明、陳新雄：《蘇軾海洋文學析論（一）》，《文與哲》第 10 期（2007 年 6 月），頁 309。

⁸⁹ [宋]釋道潛（參寥子）〈別蘇翰林〉：「四海窺人物，其誰似我公。論交容未契，許國見深哀。漸遠吳天月，行披禁殿風。玉堂清夜夢，解后過江東。」見《全宋詩》，卷 917，第 16 冊，頁 10761。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錢塘江南西興浦口的落日餘暉，以及西湖西畔的暮山煙霏，都是兩人經常相聚流連的杭州勝景，在平淡白描的文字中，不著痕迹地流露出與友人參寥子親密無間的感情。

邁克·克朗曾指出：「地區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繫物樁，拴住的是這個地區的人與時間連續體之間所共有的經歷。隨著時間的堆積，空間成了地區，它們有著過去和將來，把人們捆在它的周圍」⁹⁰。杭州地區觸目皆美的山水風情，就像一個繫物樁般，將蘇軾與好友陳襄、袁濟、參寥子等隨著時間所堆積的美好記憶，緊緊地捆在一起，形成牢固親密的友誼。

另有藉別地淒景寫其別友的不捨之情，如：

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行香子·丹陽寄述古〉，熙寧七年正月，頁45）

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菩薩蠻·西湖送述古〉，熙寧七年七月，頁81）

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南鄉子·送述古〉，熙寧七年七月，頁85）

畫堂新締近孤山。曲闌干。為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熙寧七年七月，頁78）

以錢塘江的飄雪落梅、西湖上的蕭蕭秋雨、杭城外的橫陳亂山、近孤山的飛絮落花等意象所呈現出的紛亂感、惆悵感，寫出送別陳襄的不捨情意。又如：

東武望餘杭。雲海天涯兩杳茫。……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却姓楊。（〈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熙寧七年九月，頁90）

⁹⁰ 邁克·克朗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是地區還是空間〉，《文化地理學》，第七章（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6。

送客歸來燈火盡。西樓淡月涼生暈。明日潮來無定準。潮來穩。舟橫渡口重城近。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為解佳人慍。莫學時流輕久困。頻寄問。錢塘江上須忠信。(〈漁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元祐四年八月，頁 602)

落花已逐迴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木蘭花令·次馬中玉韻〉，元祐六年三月，頁 660)

門外東風雪灑裾。山頭回首望三吳。(〈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學官〉，元祐五年，頁 635)

以杳茫的雲海與燈火淒冷的河塘襯托別楊繪時迷茫淒清的心情，藉燈盡月淡與潮無定準描寫送江公著時心頭的憂傷與不安，而鶯啼花落、白雪灑裾則分別暗示送別馬中玉、梅庭老時落寞與紊亂的心緒。這些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使作者情感的呈現更加含蓄蘊藉，在「以我觀物」⁹¹的深情凝視中，更流露出蘇軾與友人們的深情厚意。

還有藉與友相約歸隱之地寫友情之篤，如：

陽羨姑蘇已買田。相逢誰信是前緣。莫教便唱水如天。我作洞霄君作守，白頭相對故依然。西湖知有幾同年？(〈浣溪沙〉，元祐六年正月，頁 645)

「洞霄」宮是杭州著名的道觀，⁹²蘇軾對於有同樣志趣（皆在江蘇買田作致仕定居的打算）的同年友人葉溫叟（字淳老，由兩浙路轉運副使調任主客郎中，將離杭而去），表明欲與之終老杭州、不再分離的願望：願淳老作杭守，自己乞作洞霄宮

⁹¹ 王國維：「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見《人間詞話》（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年），頁1。

⁹² [宋]潛說友〈寺觀〉，《咸淳臨安志》：「洞霄宮，在（餘杭）縣西南一十八里，漢武帝元封三年創宮壇於大滌洞前，為投龍祈福之所。唐高宗時，遷於前谷，為天柱觀。光化二年錢王更建。國朝大中祥符五年，漕臣陳文惠公堯佐，以三異奏（一地泉涌，一祥光現，一枯木榮），賜額為洞霄宮。」，卷75，頁723。

提舉⁹³。從反面呈現故友即將遠離、難以抑制的眷戀之意。又如：

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八聲甘州·寄參寥子〉，元祐六年三月，頁 668）

參寥子與蘇軾是誦詩題詠、世間少有的投契好友，詞中以謝安無法實現歸隱雅志的遺憾，⁹⁴殷殷提醒友人勿重蹈前人覆轍，⁹⁵一定要在將來一同歸隱杭州，充分流露出與參寥子濃郁的情誼。

蘇軾杭州詞中，無論是與友人暢遊湖山美景、在淒景中黯然道別，或是相約白首歸隱於杭州，皆可見出杭州吸引人的地域性色彩在蘇軾與友朋情誼的表達與深化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杭州與蘇軾的杭州之愛

從「人地關係」來看，「人處於主動地位，而地則處於被動地位」⁹⁶，人類是環境的中心，空間雖是獨立自主且有其內在邏輯，但是仍必須與其他社會文化現象或要素一起運作而不可分，「尤其是與人的活動不可分」⁹⁷。兩度仕杭的蘇軾，居杭共四年又六個月，在時間的積累中，他與杭州這一空間的各個要素有著頻繁

⁹³ [宋]蘇軾〈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之一「一菴閑卧洞霄宮」句，查（慎行）注：「宋朝大臣提舉宮觀，自李若谷始。熙寧初，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岳廟等，並依崇福宮置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數，人皆得以自便。」見《蘇軾詩集》，卷 33，頁 1754。

⁹⁴ [唐]房玄齡〈謝安傳〉，《晉書》，卷 79：「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臺北：鼎文書局，1992 年），頁 2076。

⁹⁵ 謝安病危還都，路過西州門時，「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後死去。謝安重視的外甥羊曇，一次酒醉走過西州門，憶起往事，「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扇，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同前註）。

⁹⁶ 王星、孫慧民、田克勤：〈人和自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6。

⁹⁷ 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年），頁 3。

而親密的互動，因而在參與許多實質的活動中，與杭州的人事物建立了熟悉感、認同感與關懷感，將原本陌生的「空間」轉形成了「地方」，艾蘭·普瑞德言：

「地方」(place) 不僅僅是一個客體。它是某個主體的客體。它被每一個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 (concern) 的建立；空間 (space) 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⁹⁸

正如前文所述，倅杭、守杭期間，蘇軾經常與好友陳襄、張先、蘇堅、參寥子等人遊賞當地的湖山美景，因此，對於杭州這一空間的經常性涉入，以及與友人歌詠「餘杭自是山水窟」(〈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的真實經驗中，蘇軾的感情因而附著其上，熟悉感、認同感亦從而建立：「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吳蜀風流自古同，歸去應須早」(〈卜算子·自京口還錢塘，道中寄述古太守〉)、「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少年遊·代人寄遠〉)、「江山故國，所至如歸」(〈杭州謝上表〉)。對蘇軾而言，杭州這一「空間」已然轉形成一個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

同時，在長期的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中，蘇軾對杭州這個「地方」，除了建立起熟悉感、認同感外，還能進一步「關懷」杭民、對這方地域做出許多實質的貢獻。通判杭州近三年，儘管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愁悶，但經世濟民的淑世之心卻未嘗稍歇：他關心民瘼、遍訪杭民疾苦，監視鄉舉、改良吏治，相度堤岸工程、賑災捕蝗，協助陳襄疏濬錢塘六井以解決用水問題等。⁹⁹由於政績斐然，受到同僚的尊敬和百姓的愛戴，如〈瑞鷓鴣·觀潮〉，在實繪弄潮者與觀潮者(蘇軾與陳襄)

⁹⁸ 艾蘭·普瑞德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年)，頁86。

⁹⁹ 蘇軾通判杭州治績，詳參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頁64-65、72；以及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78-79。

愉快的互動中，即可看出蘇軾與杭民的親密情感。黃應貴曾指出：

空間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或人為的建構環境為其基本要素及中介物，卻都不認為那是最終的，而是在其上依人的各種活動而有不斷的建構結果。……最常見的一種便是視空間為一種社會關係；這包括個人之間及集體之間的。……前者主要指夫妻或親子之間的關係。但不管那一種關係，事實上都具有階序性的不平等關係在內。……其不平等關係的權力（power）之性質不同。……夫妻或男女關係，卻是透過實際的生活過程來建構出來。¹⁰⁰

詞中「拍手欲嘲山簡醉」、「儂欲送潮歌底曲。尊前還唱使君詩」，所呈現的是一種透過實際的觀潮活動而建構出的屬於杭州空間上的社會關係：蘇軾、陳襄、杭州百姓三方間的同樂現象，彰顯的是一種在不平等關係的權力架構下和諧、親密的關係，與柳永〈望海潮〉中平民與太守娛樂活動有著明顯區隔是截然不同的。

十五年後，蘇軾再度仕杭，由於擔任太守，地位較前期為高，因此責任也相對地加大。甫到杭州，就相繼面對了水、旱、風及瘟疫等災情，遂一面請求免去租稅，一面又開倉賑濟，以緩民困；還籌款創置「病坊」，活人無數；更採「以工代賑」的辦法，發動疏浚鹽橋、茅山兩河工程，不僅使溝通大運河與錢塘江的水道得以暢通，也使得許多災民因被雇用而得以存活。身為「東南第一州」的太守，他遺留給杭州最著名的政績就是治理西湖：率民開掘西湖的葑灘，疏浚湖底，並用葑泥堆建長堤於裏湖、外湖間，南起南屏山，北至棲霞嶺等山，中開六橋以通水，並植楊柳、芙蓉於其上，而成著名的「蘇公堤」；並在湖上造三座小石塔，禁止在石塔內水域種菱荷茭白之屬，以防西湖湮塞，此即今日仍可欣賞到的「三潭印月」景點，既有治湖之功，又具景觀之美。¹⁰¹工程完成後，作〈南歌子·湖景〉云：

古岸開青葑，新渠走碧流。會看光滿萬家樓。記取他年扶路、入西州。 佳

¹⁰⁰ 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頁4。

¹⁰¹ 上述蘇軾守杭治績，詳參〔元〕脫脫等：〈蘇軾傳〉，《宋史》，卷338，頁10812-10813，以及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頁109-110。

節連梅雨，餘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元祐五年五月，頁 616）

「碧流」、「光滿」、「月明千頃」都是疏濬後的西湖美景，也是蘇軾的具體政績。杭州在蘇軾的用心治理之下，「公庭民訟少」（〈木蘭花令〉），百姓得以安居，因此，杭民將對他的感激之情化作具體的行動：「平原不似高陽傲。促席雍容陪語笑。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拚醉倒」（〈木蘭花令〉），多情豪爽的民客不惜為謙和的太守醉倒，坦率自然地流露出對蘇軾的愛戴之情；杭州全體百姓對於蘇軾的感恩行動，更表現在「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¹⁰²，但他卻期期以為不可：

我勸髯張歸去好，從來自己忘情。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 俎豆庚桑真過矣，憑君說與南榮。願聞吳越報豐登。君王如有問，結襪賴王生。（〈臨江仙·辛未離杭至潤，別張弼秉道〉，元祐六年四月，頁 683）

在這首離杭贈別杭友張弼的詞中，他請張弼轉告杭人不要立祠宇紀念自己，他的希望僅是：處於吳越故地的杭、潤兩州能夠五穀豐登而已。

在多達四年又六個月與杭州人物的親密互動中，杭州對他而言，早已是個具有真實感、充滿意義的「地方」，也是他感情所附著的「焦點」，因此，在離杭的別席上，便有著萬般的不捨：

天台舊路。應恨劉郎來又去。別酒頻傾。忍聽陽關第四聲。 劉郎未老。懷戀仙鄉重得到。只恐因循。不見如今勸酒人。（〈減字木蘭花·送別〉，元祐六年三月，頁 673）

「天台」、「仙鄉」皆指杭州，蘇軾以「劉郎」自喻，言己與杭州的因緣與情感，除了不捨之外，還隱隱預感「杭州」是個難以重返的樂園。不料，竟一語成讖，蘇軾此別杭州，果真成訣別，再也沒回到杭州了。然而，離開杭州以後，杭州的人、事、物，仍是令他魂牽夢縈的記憶：

¹⁰² [元]脫脫等：〈蘇軾傳〉，《宋史》，卷 338，頁 10814。

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路。(〈生查子·訴別〉，元祐七年八月，頁 714)

三年枕上吳中路。曾濕西湖雨。(〈青玉案·和賀方回韻送伯固歸吳中故居〉，元祐七年八月，頁 716)

莫怪歸心甚速，西湖自有蛾眉。若見故人須細說，白髮倍當時。小鄭非常強記，二南依舊能詩。更有鱸魚堪切膾，兒輩莫教知。(〈烏夜啼·寄遠〉，未編年，頁 819)

西湖湖邊的小路、美麗的歌女，以及湖中美味的鱸魚，都是他醒時、夢中無時或忘的杭州記憶。蘇軾曾寫信給杭州太守陳師仲說：「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惠，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¹⁰³，而這種「前緣」之感，實乃源於他與杭州人民長期以來頻繁互動中所建立的美好情誼，以及他對杭州事、物經常性涉入後所交織出的熟悉親切的情味。

四、結語

杭州是一兼具自然與人文之美的都會，在方志雜記中有較客觀而全面的紀錄，惜作者本身情感卻隱而不見。首先對杭州作情意書寫的首推北宋詞家潘閬，其〈酒泉子〉十首以小令形式寫出杭州的清美出塵，並暗示其出世之想；而後柳永〈望海潮〉、張先〈破陣樂〉則從平民視角實繪杭州的都會之繁與山水之麗，目的在歌詠渲飾杭守的功業，卻未見作者個人情思。蘇軾兩度仕杭，與杭州因緣極為特殊，在其心眼靈視下、由詞筆構設出的杭州，除了兼融前輩詞家出塵與寫實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象之外，還能超越其影響，以更大的篇幅與更多樣的技巧來描寫杭州的山水之美，以更細膩的觀察刻劃杭州都會的娛樂之姿，以更寬廣的視角率先以詞體書寫杭州的節慶風俗及多樣人物；尤其可貴的是，詞中處處表現出其個人的內在情思與性靈，即融攝著個人出世的自由曠達之思與當權者入世的愛民

¹⁰³ [宋]蘇軾：〈與陳師仲主簿書〉，《蘇軾文集》，卷 49，頁 1428。

親民之情，展現出一種獨特的「蘇軾精神」¹⁰⁴。

以「杭州」為中心來考察，蘇軾詞筆下出塵的杭州，有煙雨空濛、古松挺立、高僧晝夢的恬適西湖，有風清霞明、佳人彈箏的仙靈西湖，亦有雨後初晴、自己獨棹小舟的平靜西湖；更有清風送香、流水舞藻、引發天仙想像的風水洞，還有翻騰變化、撼人心弦、惹人綺思遐想的錢塘海潮。這些或柔美、或雄偉的出塵景致，以及或睡、或棹的人物舉措，皆或明或暗地透顯出蘇軾自由曠達的閒適之情及意欲超脫塵世的出世之想。至於其詞筆下寫實的杭州，則以當權者視角實寫杭州山水奇美與繁華太平兼具的特殊都市型態¹⁰⁵：其一，描繪杭州地景之奇美，含城內沙河塘繁華中有清朗的夜景、西湖親切多情的山水風韻、錢塘江的弄潮之奇險與觀潮之歡樂；其二，呈顯娛樂姿態之豐富，有文士筵席間歌舞佐酒的聲色享受，有官員休暇時約客早食西湖、至夜才散的社交娛樂，有蘇軾與門生宴席後的鬥茶活動，還有杭民於民俗節慶時的游賞宴樂；其三，刻劃節序風俗之繁盛、豪奢，如元宵時能發初春之興的翦綵，端午的菖蒲酒與粽子，七夕時為乞巧而結製的朱樓綵舫，重九的登高、賞菊及佩戴茱萸；其四，特寫多種人物之風采，有官員曹輔的迷糊個性，有歌妓的傾城之姿、動人歌聲及憂愁神韻，有禪師大通的通融豁達，也有陳直方侍妾的美貌與多情。在這些杭州地景、娛樂、風俗、人物等都市元素的真摹實寫中，也凸顯了蘇軾與友朋、杭民相親相得的真切形象。

以「蘇軾」為中心來考察，幽靜出塵的杭州山水撫慰了他通判杭州時政治失意的低沉心靈，在靜觀山水之美時，能消除物我界限，以「閒靜」的審美心胸，映照出與山水相同的恬淡心境與超脫自在；然而，守杭時的蘇軾，因歷經了烏臺詩案的打擊與人間離別的悲傷，面對杭州山水清景時，透顯出的卻是一種江海為家的孤獨心境與生命有限、富貴虛幻的人生感慨，但樂觀的蘇軾，能從早生華髮、人生如寄的憂愁中求得心靈的超越和昇華，尤其在面對錢塘海潮的雄偉景象與寬廣視野時，能憑其浪漫不拘的神話想像，在描寫海潮的聲勢之中，寄寓內心急欲超脫生命桎梏的自由之想。在朋友之情方面，由於杭州特殊的山水風情、便利的地理交通與繁華的經濟榮景，使得蘇軾在杭的交游廣闊、社交頻繁，與名臣、賢士、僧人們形成了密切的交游網絡；而杭州秀麗的地景更成為蘇軾與友朋間友誼

¹⁰⁴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頁 62。

¹⁰⁵ 劉勇強曾指出杭州具有兼有繁華榮景與山水詩酒文化的「雙重都市個性」，亦可用以形容蘇軾詞中所呈顯的杭州都市個性。見〈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第 5 期（2001 年），頁 60-61、67-69。

的催化劑與凝聚地，詞中處處可見他藉相聚地美景寫與友朋的相契之情，亦可見他藉別地淒景寫其別友的不捨之情，還有藉與友相約歸隱之地寫友情之篤者，杭州地域，深化了他與朋友間的情誼。至於他的杭州之愛，是經由四年又六個月長期與杭州人事物親密互動及記憶積累的結果；無論倅杭或守杭時期，他對這方地域做出許多實質貢獻，詞中亦經常表現他與杭民的愉快互動，以及杭民對他的愛戴之情；從人地關係來看，杭州這個空間對他而言，已是一個感情附著的「地方」，於是在離杭時便有萬般不捨，離杭後更是魂牽夢縈，認為自己與杭州人民交織出的美好情誼實是命定的「前緣」。

「文人得江山之助，江山借文人風流」¹⁰⁶，蘇軾得杭州江山與人文的地域文化之助，在外放杭州的低潮中找到了心靈的慰藉，並將杭州出塵與寫實的印象大量寫入詞中，遂成就其詞清朗秀麗中蘊涵了雄奇、空靈的內涵與風格。相對地，杭州亦因蘇軾而益發風流，尤其是他將西湖喻為美人之眉目、將錢塘海潮想像為仙人之升降，又對杭州城市的娛樂、風俗、人物等繁華圖像作生動書寫、對杭州人事物的情感作熱切抒發，以及其自身在杭州愛民形象的具現、調和入世與出世思維的呈顯，皆讓杭州這一名都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更加引人注目。

¹⁰⁶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頁 38。

引用文獻

- 巴壺天、戴培之編：《兩晉南北朝文彙》，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年。
-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王星、孫慧民、田克勤：《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王國維：《人間詞話》，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 ：《西湖游覽志餘》，《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 伊永文：《宋代城市風情》，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艾蘭·普瑞德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年。
- 吳自牧著，符均、張社國校注：《夢梁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 吳德崗：〈地域文化與蘇軾詞的創作〉，《文史雜誌》第2期，2001年，頁38-40。
- 村上哲見著，楊鐵嬰譯：《唐五代北宋詞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 李斯托威爾著，蔣孔陽譯：《近代美學史評述》，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
- 周密：《武林舊事》，《叢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孟元老著，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宗懔著，王毓榮校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 房玄齡著：《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
- 林正秋：〈隋唐時期杭州都市的興起與發展〉，林正秋等：《古代杭州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學院出版社，1981年，頁68-73。
- 施諤：《淳祐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倪士毅：〈治杭八六載有國七二年——吳越國始末〉，周峰主編：《吳越首府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14。
-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廣文書局，1998年。

-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 夏承燾：〈西湖與宋詞〉，《夏承燾集》，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4-152。
- 徐規、林正秋：〈五代十國時期的杭州〉，林正秋等：《古代杭州研究》，杭州：杭州師範學院出版社，1981年，頁74-81。
- 袁文：《甕牖閒評》，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
- 高濂：《遵生八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3年。
- 張邦基：《墨莊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張炎：《詞源》，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
- 陳文新：《六朝小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 陶弘景：《真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傅樂生著，鄧仕樑譯：〈中國山水詩的起源〉，中大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委員會編譯：《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3年，頁113-123。
- 焦俊霞：〈地域文化對蘇軾詞的影響〉，《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第5期，2003年，頁59-61。
- 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
- 葉嘉瑩主編，朱靖華等編：《蘇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
- 董誥等輯：《全唐文》，臺北：啟文書局，1961年。
- 鄒同慶、王宗堂校註：《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第5期，2001年，頁60-69。
- 劉昭明、陳新雄：〈蘇軾海洋文學析論（一）〉，《文與哲》第10期，2007年6月，頁271-323。
-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
-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蔡襄：《茶錄》，《荔枝譜（外十四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龍榆生：《東坡樂府箋》，臺北：華正書局，1978年。
-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薛瑞生校註：《樂章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邁克·克朗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薩特著，李一鳴譯：《想像心理學》，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釋惠洪：《冷齋夜話》，《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James Whipple Miller,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Chinese Nature Poetry”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4, Summer 1972.

Joseph Addison, “The Spectator” :412,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d.
Walter Jack Bate Rpt. Taipei: Yeh Yeh Book Gallery, 1968.

Rene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Ed. S. Nichols. New Haven: Yale UP, 1967.

Understanding the Writing of Su Shih's Ci-poems at Hangzhou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gional Culture

Yan, Jy-ing*

[Abstract]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Hangzhou has always been a beautiful and prosperous seaside city in southeast of mainland along with unique local culture. After the middle of North Sung Dynasty, Hangzhou has become the capital of busy commerce. Moreover, Ci-poem's creating and spreading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city of booming trading business. For example, Su Shih, being a government officer of Hangzhou twice, wrote almost fifty Ci-poems about nature and society of Hangzhou expressing his affections to the city. He produced much more Ci-poems than any other Ci-poet in his generation. Su Shih was an eminent writer with plenty talents, complicated thought but open-minded. He brought up an interesting topic based upon his observation in the area of Hangzhou's nature and society plus his bright spirit as well as working experience at Hangzhou, definitely deserves a deeper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look into the writing of Su Shih's Ci-poems at Hangzhou, to reveal the city living style of Hangzhou through Su Shih's delicate observation, and to find out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of his Ci-poems influenced by Hangzhou's regional culture.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Keywords: Su Shih's Ci-poems, regional culture, Hangzhou writing, nature, society, feelings and thoughts

